

国家文化贸易 发展研究

冯 洁 著

STUDY OF NATIONAL CULTURE
TRADE DEVELOPMENT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当代文化贸易发展研究(14NDJC148YB)

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中苏文化贸易史研究(1949—1966)(Y201432407)

《国家文化贸易发展研究》系浙江省重点培育智库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省文化产业
创新发展研究院成果

国家文化贸易发展研究

冯 洁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 杭州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文化贸易发展研究 / 冯洁著. — 杭州: 浙江
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9. 4

ISBN 978-7-5178-3113-6

I. ①国… II. ①冯… III. ①文化产业—国际贸易—
研究 IV. ①G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97657 号

国家文化贸易发展研究

GUOJIA WENHUA MAOYI FAZHAN YANJIU

冯 洁 著

责任编辑 王 耀 白小平

封面设计 林朦朦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高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70 千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3113-6

定 价 6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目录

第一章	绪 论 / 001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001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004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023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028
第二章	国际文化贸易的概念渊源和法律界定 / 029
	第一节 文化与贸易 / 029
	第二节 国际文化贸易 / 032
	第三节 国际教育服务贸易 / 038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041
第三章	新中国文化贸易的时空坐标 / 043
	第一节 新中国文化贸易与传统文化贸易的比较 / 044
	第二节 新中国文化贸易与西方文化贸易的比较 / 057
	第三节 新中国文化贸易与社会变革的同构性 / 062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066

第四章	新中国文化贸易的战略选择 / 067
	第一节 冷战初期美国与苏联的文化政策与宣传 / 067
	第二节 新中国国家文化贸易关系的形成 / 071
	第三节 新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性质的变迁 / 074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083
第五章	新中国文化贸易的经济价值(出版) / 084
	第一节 新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出版贸易的发展 / 084
	第二节 新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出版贸易状况 / 97
	第三节 本章小节 / 103
第六章	新中国文化贸易的文化特征(电影) / 104
	第一节 新中国电影产品的输入与社会认同 / 104
	第二节 新中国电影周、国际电影节与社会认同 / 113
	第三节 新中国电影贸易的逆差与国家文化安全 / 120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123
第七章	新中国文化贸易体制的苏联模式(电影) / 125
	第一节 苏联电影模式的形成、演变与特征 / 125
	第二节 新中国电影事业中“一边倒”的政策与实践 / 133
	第三节 苏联模式影响下的新中国对外电影贸易体制 / 139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144
第八章	新中国文化贸易的制度建构 / 145
	第一节 驱动对外出版贸易的商业机制 / 146
	第二节 规范对外出版贸易的政府规制 / 156
	第三节 构建对外电影与演出贸易的商业机制和政府规制 / 164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176

第九章	新中国文化贸易的特殊形态(派遣留苏学生) / 180
	第一节 派遣和管理留学生的政府规制和机构建制 / 181
	第二节 派遣留苏学生的发展状况 / 185
	第三节 留苏学生的社会贡献 / 194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196
第十章	新中国文化贸易的特殊形态(聘请苏联专家) / 197
	第一节 聘请苏联专家的政府规制和机构建制 / 198
	第二节 聘请苏联专家的发展状况 / 201
	第三节 苏联专家的社会贡献 / 209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212
第十一章	新中国文化贸易的组织建设(国际书店) / 214
	第一节 国际书店管理体制与运营方式 / 214
	第二节 国际书店组织架构 / 219
	第三节 国际书店队伍建设 / 222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226
第十二章	总结与启示 / 227
	第一节 总 结 / 227
	第二节 冷战背景下中苏文化贸易给我们的启示 / 238
	参考文献 / 246
	后 记 / 256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意义

国际文化贸易是文化产业的一种重要形态,它随着国际文化产业的发展而发展,在构建国家形象、提升一国的综合竞争力、增加社会财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国际文化贸易在人类社会发进程中产生,同时对社会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初具规模,国际文化贸易日益频繁。此后,有关文化产业及文化贸易的研究变得活跃起来。西方文化产业的理论发展经历了由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激烈批判到伯明翰学派辩证地看待并支持文化产业,再到知识经济时代学术界开始对文化产业普遍的理解与认同的发展过程。中国文化产业学术框架的构建则是在西方理论体系框架下的引进与本土化中发展完善的。在世界市场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相对较少阶段,西方学者对文化贸易的研究从内涵和适用理论展开。随着世界经济进入持续发展阶段,国际贸易秩序日趋合理,国外学者对文化贸易驱动因素及效用进行了大量研究。当前,美国、日本、德国等主要文化贸易国家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在国际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国外学者在注重文化驱动因素实证研究的同时,更加强调文化贸易保护政策研究。进入 21 世纪,中国学者对文化贸易开始进行大规模研究,无论是将文化产业解读为工业技术力量对文化的渗透、控制,将文化产业视为在工业社会遭遇瓶颈时助推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手段的研究,还是对文化贸易驱动因素和保护政策的研究,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文化产业及其文化贸易的发展深深嵌入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对社会变革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工业化社会文化产业政策在许多国家的政策层面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相继提出扶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美国的文化政策不是独立的、以单独法律或法规条文的形式存在,而是渗透于国家战略和政治、外交、军事、贸易政策之中,对内采取放松管制的方式,促进国内文化产业竞争与多元文化发展;对外极力向世界输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为美国霸权服务。依托充分的市场竞争与强大的社会力量支撑,美国形成了高效独特、有竞争性的文化运作体系。英国政府采取的是“扶植文化产业”发展战略,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20世纪90年代末,英国政府成立了以文化大臣为主的文化产业行动小组。加拿大政府提出“向外输出”发展战略,政府制定了非常完备的优惠政策来鼓励本国文化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由此促进了加拿大的文化出口迅速发展。同处国际文化贸易强势地位的日、韩秉持“文化例外”国际惯例,实施赶超型文化贸易政策,以文化产业实力保持国际文化贸易竞争优势。2009年,日本政府发布《日本品牌战略——让“软实力”成为经济增长动力》,把动漫产业等定位“软实力产业”,全面实施产业振兴,以“老少咸宜”的品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日本的文化贸易以“哆啦A梦”等一系列动漫形象、“酷日本”的文化理念俘获了各国消费者,在提升日本国际形象的同时也促进了日本文化产业发展。韩国不仅提出“文化立国”战略,还通过创办文化产业振兴研究院等机构,实施积极的文化贸易政策,成就了“韩流”的世界影响力。韩剧等文化产品在被国外民众接受的同时,其他产品也畅销一时。

我国的文化贸易研究一直与国家战略需求密切相关,学者对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研究成果是比较多的。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最早由胡惠林提出,中国的文化产业要“走出去”,必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考虑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重建我国文化外贸的政策系统和法律系统,改革我国的文化贸易体制。^①花键认为“大力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已成为中国增强文化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战略突破口”^②,再次肯定了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

① 胡惠林:《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走出去”战略》,《思想战线》2004年第3期,第89页。

② 花键:《“走出去”:中国文化产业的必经之路》,《社会观点学》2005年第4期,第10页。

的重要性。胡惠林指出“低碳”是当今国际社会正在积极建构的物质发展原则,把这一原则应用和运用于文化建设尤其是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中,应该成为我们实现文化“走出去”战略“国际化”转型的文明起点。^①此后,有关文化贸易的研究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及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大语境下展开。国家文化安全的保护,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文化贸易转型路径,国际贸易体制的新变革与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应对策略,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文化贸易制度创新的研究等都是这段时期有关文化贸易的研究内容。近几年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文化贸易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实践途径,有关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国际文化贸易的研究及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文化贸易的发展研究成为新的热点。毫无疑问,文化贸易研究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

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对当下文化贸易的研究不得不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开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整体状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外文化贸易从实质上来说就是中国与苏联的文化贸易。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对中国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一边倒”政策开始的。早在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宣布“一边倒”。1950年2月,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同盟关系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一边倒”方针最终得以实施。实行这一政策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国内外形势、共同的社会主义理想、国家利益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发展方向上倒向苏联,苏联模式也自然成为中国效仿的模式。从理论到实践,从政治体制、军事武装到经济、文化建设都学习苏联,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而文化在这种巨大的集体认同感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国际史研究的范畴中,经济、文化、社会已被纳入观察视野,中国学者对“经济冷战”的研究在中苏关系中有一些成果,对于“文化冷战”的研究相对比较落后,本书关于中苏文化贸易的研究成为研究中苏关系的一个新视野。

在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外文化贸易对新中国文化建设与社会转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文化形

① 胡惠林:《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转型》,《人民日报》2010年9月21日,第24版。

态,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贸易自然与近代中国的对外文化贸易有着根本的不同,同时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贸易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有着冷战国际背景下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时期的对外文化贸易体制、机制、组织结构、制度建设等对今天的文化贸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一带一路”倡议宏观背景下开展文化“走出去”的工程建设,需要对社会主义文化贸易做一个整体的、历史的剖析。1949—1966年恰好是文化生产方式变革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最初阶段,研究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但有助于理解文化生产的社会历史建构作用,而且也为分析当代中国文化生产方式的转型和社会变革提供了历史依据。

第二节 研究综述

国内对中国文化贸易的相关研究丰富而又贫乏。关于中苏国家关系的研究角度主要有政治、经济、军事,而对冷战文化史的研究是个薄弱环节。不同门类的研究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状况,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研究质量,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和电影的研究都优于其他门类。这些研究主要从行业发展史的角度去梳理历史脉络。在新的研究趋向中,基于社会史研究的视角仍大于产业视角,聚焦文化贸易的体制机制、组织结构、管理方式、市场运营、制度建构的研究非常少;派遣留苏学生与聘请苏联专家的历史过程描摹得相对比较充分,而从教育服务贸易的视角展开论述则没有。对史实的梳理为本文的机制分析提供了扎实的依据。国外相关的文化传播研究和文化贸易基础理论研究十分丰富,这为本书中对文化贸易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总体而言,相关研究可大致分为文化贸易之中苏国家关系研究、生产主体研究、组织研究、生产活动研究、国际文化贸易的相关研究。

一、国家关系中的文化贸易主体研究

新中国文化贸易主要是在中国与苏联两个国家之间展开,中苏国家关系的变迁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开展文化贸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冷战时期中苏关系的研究重心一直都围绕着中苏分裂的起源及其性质:意识形态分歧、文化差异、国家利益的冲突。冷战结束后,随着中苏双方相关文件和档案

的逐步解密,学者对中苏关系的研究取得了比较大的突破。在西方出版的论著中,德国学者海因茨希在《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2001)中对中苏同盟建立的过程进行了详尽讨论。比较近的两项研究成果将中苏分裂的研究推向新的层次。在广泛利用中国、俄罗斯、美欧档案的基础上,吕德量于2008年出版了《中苏分裂:共产主义世界的冷战》一书,将中苏的主要分裂定位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歧上。谢尔盖·拉琴科的《两个太阳:中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1962—1967》考察了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1962到1967年间中苏关系恶化的过程。谢尔盖利用了苏联和蒙古的原始档案及大量二手资料,探究了苏联领导人对中苏分歧的态度和决策。詹姆斯·赫什伯格、谢尔盖·拉琴科、王俊逸、王大卫:《对华国际真相:揭开中苏关系最后阶段的史诗》(2011)是研究冷战后半期中苏关系的文章,文章揭示了一个由克里姆林宫设立的组织“对华国际”的产生,以及其职责的拓展、消亡的情况,让人们对这个冷战后半期中苏关系和苏联对华政策中的关键环节有所了解。此外,旅美华人学者张曙光,美国学者陈兼、魏丽莎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中苏关系做了研究。在苏联,综合性专著的作者大体上都是负责对华事务的职业外交官或党内干部,主要为斯大林政策进行辩护,虽然论述的意识形态浓厚,但具有史料价值。70年代初,苏联思想出版社出版了鲍里索夫和特罗斯科夫合著的《中苏关系》,利用了苏联官方保存的档案资料,反映了苏联当局的基本观点。

中国学者对中苏关系的研究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特别是沈志华、杨奎松、牛军、李丹慧等人的研究引起了国际学界的重视。沈志华以他大量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乃至国际史学界对中苏关系、朝鲜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2012年12月,九州出版社出版的《沈志华:冷战五书》收录了沈志华1994年以来发表的部分研究成果,对中苏关系做了详尽的分析。其中,《中苏结盟:冷战的转型》对中苏高层之间在建立同盟问题上的博弈做了重点阐述,对中苏合作过程中的经济、军事等问题也有所涉及;《脆弱的联盟:冷战中的盟友》讲述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发展和演变,分析了冷战在亚洲的形成;《中苏分裂:冷战的再转型》围绕着国家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分析了中苏同盟最终走向分裂,冷战在全球也出现复杂化的倾向。牛军的学术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冷战与中国外交关系的历史,《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一书是其二十年研究最有价值的论文汇集。有关中苏关系的内容涉

及中苏同盟的起源、毛泽东的“危机意识”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1980年中苏关系研究。杨奎松对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历史做了全新的不同于过去的解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1999)根据大量有关中苏档案和亲历者的回忆,按历史发展的顺序,对涉及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历次重大事件,以及毛泽东的性格和处事特点做了描述。李丹慧主编的《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对冷战的起源、美苏冲突的演变过程、中苏结盟和走向分裂的原因、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内部结构等做了详细的介绍。胡惠林的论文《论文化冷战与大国文化战略博弈》则指出了20世纪东西半球冷战的实质是对意识形态的争夺,在这场美苏争霸中,中国运用文化外交手段有效地破解了苏联对中国构成的巨大国家安全压力。^① 中苏关系的研究为十七年时期中苏文化服务贸易研究铺展了一个宏观背景。

二、国家关系中的文化贸易生产主体研究

有关新中国出版活动主体的研究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的相关人物众多,但是对与对外出版贸易相联系的主体的专门性研究匮乏。罗智国的《胡愈之与新中国出版体制的建立》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在学习苏联模式基础上实行编辑、印刷、发行三家分立的出版体制,是一种富有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体制。^② 吉少甫的《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开拓者:建国初期胡愈之在出版署的活动纪要》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胡愈之在出版总署的有关活动。^③ 舒新的《新中国派遣第一批学习出版业务的留学生》记载了1952—1956年新中国派遣第一批学习出版业务的留学生的留学情况,共有13人。^④

与电影贸易主体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电影体制机制、电影引进输出相关的人物和事件有所记录。比如“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对207

① 胡惠林:《论文化冷战与大国文化战略博弈》,《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第34页。

② 罗智国:《胡愈之与新中国出版体制的建立》,《现代出版》2013年第5期,第71页。

③ 吉少甫:《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开拓者:建国初期胡愈之在出版署的活动纪要》,《编辑学刊》1996年第4期,第10页。

④ 舒新:《新中国派遣第一批学习出版业务的留学生》,《出版史料》2004年第2期,第20页。

个电影界老人进行了近 2000 个小时访谈,分为《海上影踪:上海卷》《长春影事:东北卷》《影业春秋:事业卷》和《银海浮槎:学人卷》四卷(2011),力图打破主流电影史的框架,涵盖中国电影史上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各种人和事。《胡健访谈录》中老电影人胡健讲述了有关中影公司的经历。二是译制和配音,特别是有关配音的回忆比较多。袁乃晨被称为新中国译制片之父,孙渝烽的《那年月我们用声音造梦:记译制片配音的人和事儿》,徐燕、陈滢主编的《银幕传情:与中国当代译制片配音演员对话》,曹雷的《远去的回响:六十部译制片配音笔记》,潘争的《棚内棚外:上海电影译制厂辉煌与悲怆》,孟雄等的《成绩卓著各有千秋——简介上影译制厂几位配音演员的配音特色》,李东东的《东影译制片:母亲成就理想的地方》《张玉昆:新中国译制片配音第一人》等生动地讲述了一大批译制配音工作者的台前幕后故事,保存了有关配音事业的大量材料。

在文化贸易研究中,对苏联专家与留学生这两类群体的记录是比较多的,但是专门性研究活动在国际学界尚未得到很好的开展。苏联专家的著作以 50 年代居多,主要内容是苏联专家的谈话、报告、工作建议及指导、讲课,苏联专家在全国各地的工作生活以及与中国人民的友谊。比较近的著作只有三本,沈志华的《苏联专家在中国》可能是唯一一本研究苏联专家的专著,罗时叙的《由蜜月到反目——苏联专家在中国》、刘人伟的《永恒的记忆:苏联专家基列夫的中国情结》是纪实文学作品。在期刊论文中,比较突出的研究集中在教育领域,苏联专家与我国高等院校的建立、发展有深刻的联系,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央音乐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对此都有专门性的研究。高等院校聘请苏联专家的历程、特点及其影响,苏联专家对高校实验室建设、高校政治理论课程的建立、中国教育学术转型以及对中国空军教育的影响等均有涉及。论文对援华苏联军事专家、苏联法学专家也进行了群体考察。

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留苏运动的介绍主要散见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和一些纪实性书籍之中,主要有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主编的《新中国留学归国学人大词典》(1993),宋健的《百年接力留学潮》(2003),朱训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忆留苏岁月》(1997),单刚、王英辉的《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2007),邓守强的《留苏岁月》(2007),欧美同学会留苏联与

独联体分会主编的《学子之路：新中国留苏学生奋斗足迹》(2000)，以及留苏学子夔中羽、王殿儒、李兴耕的回忆录。这些著作回顾历史，客观地反映了留苏学子在苏联、东欧国家学习的概况，虽然不是学术著作，但书中提供的资料对研究留苏运动仍具有借鉴意义。史类书籍如赵峰等编著的《新中国六十年留学大事概览：1949—2009》对60年里我国留学工作进行了客观记述，向世人呈现了1949年以来我国留学工作的发展历史、我国留学政策变迁的基本脉络和变革要点，以及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的战略决策与意图；李喜所编著的《中国留学通史(新中国卷)》系统全面地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留学生教育史，折射出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走向，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现代化的演进历程；李涛的《借鉴与发展——中苏教育关系研究(1949—1976)》从教育学的角度对教育交流史进行了回顾，客观地反映了留苏学子在苏联、东欧国家学习的概况；张柏春等著的《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①从技术史的角度进行研究，把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看作一种“高等教育中的技术转移”；还有郝世昌等的《留苏教育史稿》也是属于这一类的研究。对档案材料的大量挖掘使用是这两部著作的一个特点，教育部、外交部、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市档案馆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李鹏的《留学与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留苏教育研究》在系统梳理前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原始档案材料，全景式地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留学苏联的历史进程和深远意义。周尚文等的《新中国初期“留苏潮”实录与思考》^②采用两方面的实证调查，一是查阅半世纪前所存相关档案；二是用对当年留苏学生进行个别访问、问卷调查、开座谈会等形式，力求全面地还原新中国成立初期留苏运动的全貌，并尽可能对其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做出客观的评价。左玲的《新中国建立初期归国留学生群体政治认同的模式与特点》^③系统分析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归国留学生这一群体政治认同的主客体关系、作用机理、生成过程和社会基础四个方面来看，这一认同模式具有统一性与动态性的交错融合、原生性与工具性的有机统一、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复杂嬗变、历史记忆与目标理想的契合共

① 张柏春：《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周尚文、李鹏、郝宇青：《新中国初期“留苏潮”实录与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③ 左玲：《新中国建立初期归国留学生群体政治认同的模式与特点》，《郑州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生等特点。马慧莉、刘文楠的《两个革命之间：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1948—1966）》阐述了20世纪50年代和19世纪60年代留学苏联的中国学生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显赫代表，与“苏联社会主义”中的普通人、各级机构与环境格局进行着直接互动，论文对这段历史做了多纬度的阐述。^①

综观各具体门类的文化贸易主体研究，在出版和电影领域比较关注的是人物的生平事迹与其在相关领域的活动，而直接涉及文化贸易生产活动的研究极度匮乏。有关派遣留学生和聘请苏联专家整体活动的研究相对充分一些，但对从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视角去考察和定位新中国成立初期境外消费与自然人流动群体的研究却不多见。

三、国家关系中的文化贸易生产组织研究

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贸易组织的研究围绕顶层管理组织与生产机构的创建发展、核心人物、主要作品、社会影响展开，而对具体开展文化贸易的组织机构——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国际书店）、中影公司、北京演出经理公司——的组织形态、经营方式的专门性研究严重匮乏。

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对外出版贸易的组织主要是顶层管理机构出版总署，执行机构是国际书店（后改名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和外文书店。1952年国际书店成为实际上垄断书刊进出口的贸易机构，1964年1月国际书店进出口正式分开，中国外文书店负责书刊进口业务，国际书店则专营书刊对外发行业务。冯建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总署沿革的历史考察》中介绍了出版总署的发展历史，表明出版总署的设置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宏大历史紧密相连。从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到出版总署再到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机构更替的背后潜藏着“统一—认同—优化”的现实逻辑。^② 符紫如的《外文图书发行面面观》部分内容阐述了外文书店的历史沿革。于森的《北京国际书店正式开业》、佚名的《苏联为中国大学生出版的俄语教科书在我国外文书店新华书店开始发行》从资料的角度记录了对外出版贸易组织的状况。

关于出版贸易产品生产机构的研究比较多的集中在对输出书刊的翻译

① 马慧莉，刘文楠：《两个革命之间：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冷战国际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50—78页。

② 冯建辉：《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总署沿革的历史考察》，《出版发行研究》2014年第7期，第96页。

上,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时期承担外宣书刊翻译任务的出版社主要是外文局(1949年10月1日成立国际新闻局,1952年该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1963年9月外文出版社改组为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即外文局)和中央编译局。新星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中国外文局五十年》丛书,包括《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回忆录》《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书刊对外宣传的理论与实践》,对外文局的历史发展做了详尽的梳理,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类似的还有汪祖棠的《外文出版社五十年历程:1952—2002》(2002)。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时期的中国文学外译开创了以国家机构为主导的对外文学翻译模式,倪秀华的论文《建国十七年外文出版社英译中国文学作品考察》采用量化统计的方法,再现这一时期中国文学英译的整体状况与变化过程,揭示这一翻译现象与社会政治语境之间的密切关联。^①倪秀华的《“传统”的发明:建国“十七年”中国古典文学英译研究》阐述了外文出版社组织翻译的一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意图借此对外再现作为新中国之遗产的古典文学形象,证明新生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合法性。翻译古典文学作品由此成为重构或者“发明”新中国“传统”的手段。^②滕梅、曹培会的《意识形态与赞助人合力作用下的对外翻译——外文局与20世纪后半叶中国对外翻译活动》以外文局的翻译活动为例,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世纪末的对外翻译活动做了梳理,旨在重新审视国家意识形态及赞助机构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与制约。^③张西平、胡文婷的《中国外文局:新中国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镇——一个简短的历史回顾》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外文局古代作品翻译出版史做了一个简略的回顾。对中央编译局历史进行回顾的著作主要有《中央编译局五十年:1953—2003》《传播真理,奋斗不息: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50周年纪念文集:1953—2003》及俞可平主编的《马列经典在中国六十年:中央编译局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文集》。论文主要有滕梅、吴菲菲的《翻译政策作用下的国家翻译机构——以中央编译局为例》,以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政策为基础,用

① 倪秀华:《建国十七年外文出版社英译中国文学作品考察》,《中国翻译》2012年第5期,第25页。

② 倪秀华:《“传统”的发明:建国“十七年”中国古典文学英译研究》,《广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9期,第79页。

③ 滕梅、曹培会:《意识形态与赞助人合力作用下的对外翻译——外文局与20世纪后半叶中国对外翻译活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75页。

描述性方法系统研究中央编译局对翻译活动的组织与管理,研究表明国家翻译机构的各项活动均受到翻译政策的影响和规约。^① 他们的另一篇论文《国家翻译机构对翻译活动的规范——以中央编译局马列著作及“毛著”翻译为例》系统研究了中央编译局对著作及“毛著”翻译活动的组织与管理。研究发现,国家翻译机构的翻译活动受读者需求、目标语文化政治环境、社会背景及文本类型等因素的规约和影响。^②

1953—1954年,中宣部对苏联文艺、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也有过分工,但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显然不多。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翻译苏联文学书籍的最重要的出版机构,王迎胜的《50年代初我国翻译出版苏联作家作品概述》、温哲仙的《我们非常重视俄罗斯文学的译介——人民文学出版社俄苏文学出版概略》对此做了阐述。其他研究还有叶至善的《尽快翻译出版新版本的〈绞刑架下的报告〉——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封信》。

与出版贸易组织的研究状况相似,电影贸易的组织研究也集中在译制片的生产上。顶层管理机构国家电影事业管理局负责进出口电影的审查与管理,外国影片由中影公司统一输入发行,上影和长影是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的两大重镇。沈芸的《国家电影事业管理局的筹建》阐述了国家电影事业管理局的筹建过程、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管理范围及拟定5项电影管理暂行办法,电影局的建立在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历史上是一个分水岭,它预示着电影作为一个行业将告别以往行走江湖的个体生存状态,而进入了主流政治话语和国家行政规划。^③ 童刚主编的《中影50年》记录了中影公司50年的奋斗与辉煌历程,留下了中影人感怀的足迹。有关上影和长影的研究比较多,张锦主编的《长春大业(东北电影人口述历史)》全面展现了东北电影从“东北电影制片厂”到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发展过程,包含了电影厂的建设、人事更迭及制度、电影制作生产,以及电影制片厂的改革,再现了“长影”的历史和新中国电影业建设起步阶段的状况。胡昶的《新中国电影的摇篮:1949—1985》详细

① 滕梅,吴菲菲:《翻译政策作用下的国家翻译机构:以中央编译局为例》,《外语教学》2015年第4期,第110页。

② 滕梅,吴菲菲:《国家翻译机构对翻译活动的规范——以中央编译局马列著作及“毛著”翻译为例》,《中译外研究》2014年第1期,第14页。

③ 沈芸:《国家电影事业管理局的筹建》,《中国电影报》2005年12月29日,第18版。